

农民工的身份定位与流向决策*

——基于同期群效应模型的分析

董延芳 刘传江 胡 铭

【摘要】文章采用同期群效应模型研究了农民工的身份定位和流向决策,认为其影响因素包括同期群效应的强度、身份定位对失业率的边际影响、在业和失业状态下的收入差距。其后利用调查数据对结论进行了检验与讨论。

【关键词】农民工 身份定位 流向决策 同期群效应

【作者】董延芳 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讲师;刘传江 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 铭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硕士。

一、背景与综述

在中国,渐成农民工主体的“80后”与老一代大相径庭,他们不能解决城镇户口,买不起城镇住房,年纪大了离开劳动力市场时如果仍没有着落,必将形成巨大的漂泊群体。短中期内,他们的流向决策也将给城镇化建设带来较大影响。国内一些学者,对人口迁移的“中国路径”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关注农民工群体分化,目前又以农民工的代际分化为研究热点。但对于应将农民工划分为几代、划分标准是什么,争论一度较大。对于“代”的学术含义,Kertzer(1983)给出了详尽阐释,“同期群”是其中的重要一种。Ryder(1965)给出的同期群定义是“在相同时期经历了相同事件的人的集合。”Demartini(1985)认为同期群强调年龄差距,假定同龄人有着某些共同的东西和区别于其他同期群的特征。这给我们将农民工群体界定为同期群并对其进行代际划分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将改革开放以前出生、绝大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加入打工者行列的人称为第一代农民工,将改革开放以后出生、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外出务工经商的人称为第二代农民工。此界定与官方提法及王春光(200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界定并无实质不同,但其基于社会学、人口学与经济学视角,将农民工置于改革开放前后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与中国经济结构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行为选择与市民化研究”(批准号:7097309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城镇化战略与农民工代际分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批准号:10CJL035)的研究成果。

的变迁过程也基本吻合,更适用于挖掘“代”的“同期群效应”。

理论界对于什么是同期群效应尚无一致解释,但可借用埃尔德(2002)曾指出的: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生命存在于相互依赖之中,社会、历史的影响经由这一共享的关系网络表现出来。据此,农民工研究中的同期群效应可指这一群体加诸于个人的烙印对其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本文致力于研究在这种同期群效应下,农民工如何进行身份定位,从而进行流向决策。

二、模型分析

本文借鉴了国际移民领域关于移民身份的研究。Akerlof等(2000)指出了身份研究的重要性。该领域的其后进展包括理论和实证方面(Bisin等,2006;Mason,2004;Nekby,2007)。

本文在模型构建上重点参考了Battu等(2007)的研究,其从社会环境(家庭、朋友和邻居)及文化原籍(宗教或语言)定义非白人,假定人们寻找工作主要通过社会网络,结论是非白人是否选择“对立”身份取决于群体压力的大小。不过,该文研究群体压力,本文研究同期群效应,在这一点上,非白人具有“对立”倾向,农民工具具有“融合”倾向,这是本文修改其个人效用函数的原因。

(一) 效用函数

假设经济中劳动者的数量结构总和为1个单位,其中本地劳动者的数量为 N_L 单位,农民工的数量为 N_M 单位, $N_L + N_M = 1, 0 < N_M < N_L < 1$ ^①。农民工的身份定位在 $0 \sim 1$ 之间, 0 代表农民, 1 代表市民。本地劳动者的身份定位固定为 1 。假定劳动者都是风险中性。本地劳动者的效用函数为: $V_L = y_c$ 。其中, $c \in \{E, U\}$; E 代表在业; U 代表失业; y 根据 c 的取值分别代表本地劳动者在业和失业情况下的收入; $y_E > y_U \geq 0$ 。身份定位为 $x_i \in [0, 1]$ 的第 i 个人的效用函数为: $V_M(x_i) = y_c - ex_i(1 - \bar{x}_M)$ 。其中, \bar{x}_M 代表其他农民工身份定位的均值, $e > 0$ 。给定一个不为 0 的 x_i 和一个 y_c , \bar{x}_M 越大, $ex_i(1 - \bar{x}_M)$ 越小, $y_c - ex_i(1 - \bar{x}_M)$ 越大,即群体中其他人市民化水平的提高能减少单个人的市民化成本,增加其效用,反之亦然。我们可将其视为前文提到农民工同期群效应,其强度由 e 反映, e 越小强度越大。

(二) 劳动市场

不考虑劳动者自我雇佣的情况,并假定劳动市场中的歧视只针对农民工。劳动者获得工作一般经历工作信息接触和被雇主选择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两类劳动者存在相同的公共信息 $\mu, \mu > 0$ 。私人信息由社会资本决定,其中:本地劳动者的社会资本 S_L 取决于本地劳动者的在业人数 $(1 - u_L)N_L$ (u_L 为本地失业率, $0 < u_L < 1$);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S_M 取决于农民工的在业人数 $(1 - u_M)N_M$ (u_M 为农民工失业率, $0 < u_M < 1$,在一般情况下有 $u_L < u_M$)和他们认识的在业本地劳动者人数 $(1 - u_M)N_M$ 。两类劳动者的就业信息接触率 θ_L 与 θ_M 分别为:

$$\theta_L = \mu + \lambda S_L = \mu + \lambda(1 - u_L)N_L \quad (1)$$

^① 在大多数情况下, $N_M < N_L$ 成立。

$$\theta_M(x_i) = \mu + \lambda S_M = \mu + \lambda [x_i(1-u_L)N_L + (1-x_i)(1-u_M)N_M] \quad (2)$$

其中, $\lambda > 0$, 由此推出, $\theta_L > 0, \theta_M > 0$ 。易知, $\theta'_M(x_i) > 0, x_i$ 越大, 农民工接触就业信息越依赖于本地劳动者, 其就业信息接触率也越高。

第二阶段, 假定劳动者的身份是对雇主而言的唯一区别。雇主数量结构总和为 1 个单位, 其中不歧视的雇主数量为 m 单位 ($0 < m < 1$), 歧视的雇主数量为 $1-m$ 单位。那么农民工的被雇主选择率为 m , 本地劳动者的被雇主选择率为 1。所以本地劳动者的工作获得率为 θ_L , 农民工的工作获得率为 $m\theta_M(x_i)$ 。

(三) 均衡结果

在第一阶段中农民工选择身份定位; 在第二阶段中劳动市场的结果被决定。第二阶段中, 假定劳动者工作状态的改变遵循时间连续的 Markov 过程, 劳动者遭遇失业的概率为 δ , $0 < \delta < 1$ 。在某一刻, 某类劳动者进入失业状态的人数为 $\delta(1-u_c)N_c$, 重新进入在业状态的人数为 $m_c \theta_c u_c N_c$, 故有 $(u_c \dot{N}_c) = \delta(1-u_c)N_c - m_c \theta_c u_c N_c$, $(u_c \dot{N}_c)$ 为某类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人数的时间差分。静态下, 失业水平不变, 该差分为 0, 即有 $u_c = \frac{\delta}{\delta + m_c \theta_c}$ 。于是, 对本地劳动者:

$$u_L = \frac{\delta}{\delta + m_L \theta_L} = \frac{\delta}{\delta + \mu + \lambda(1-u_L)N_L} \quad (3)$$

对农民工:

$$u_M(x_i) = \frac{\delta}{\delta + m_M \theta_M} = \frac{\delta}{\delta + m\mu + m\lambda[x_i(1-u_L)N_L + (1-x_i)(1-u_M)N_M]} \quad (4)$$

解式(3)得:

$$u_L = \frac{\delta + \mu + \lambda N_L - \sqrt{(\delta + \mu + \lambda N_L)^2 - 4\delta\lambda N_L}}{2\lambda N_L} \quad (5)$$

解式(4)得:

$$u_M = \begin{cases} \frac{\delta + m\mu + m\lambda[x(1-u_L)N_L + (1-x)N_M] - \sqrt{\Delta}}{2m\lambda(1-x)N_M}, & x \neq 1 \\ \frac{\delta}{\delta + m\mu + m\lambda(1-u_L)N_L}, & x = 1 \end{cases} \quad (6)$$

其中 $\Delta = \{\delta + m\mu + m\lambda[x(1-u_L)N_L + (1-x)N_M]\}^2 - 4\delta m\lambda(1-x)N_M > 0$

再来看第一阶段。假定利率为 0, 本地劳动者效用的期望为:

$$EV_L = (1-u_L)V_{LE} + u_L V_{LU} = (1-u_L)y_E + u_L y_U \quad (7)$$

农民工效用的期望为:

$$\begin{aligned} EV_M(x_i) &= [1-u_M(x_i)]V_{ME}(x_i) + u_M(x_i)V_{MU}(x_i) \\ &= y_E - ex_i(1-\bar{x}_M) - u_M(x_i)(y_E - y_U) \end{aligned} \quad (8)$$

$$EV'_M(x_i) = -e(1-\bar{x}_M) - u'_M(x_i)(y_E - y_U) \quad (9)$$

$$EV''_M(x_i) = -u''_M(x_i)(y_E - y_U) \quad (10)$$

易知当 $\mu > \lambda, u'_M(x_i) < 0, u''_M(x_i) > 0, u'''_M(x_i) < 0$ 。此外, 可以证明 $-\infty < u'_M(0) < u'_M(1) < 0$ 。由此

得到 $u'_M(x)$ 的图像(见图 1)。基于 $u'_M(x_i)$ 和 $u''_M(x_i)$ 的性质,观察式(10)知 $EV''_M(x_i) < 0$ 。再观察式(9),得到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 $EV'_M(x_i) = -e(1-\bar{x}_M) - u'_M(x_i)(y_E - y_U) = 0$ 。考虑对称情形,即 $x_i = \bar{x}_M = x^*$,有 $e(x^* - 1) = u'_M(x^*)(y_E - y_U)$ 。令 $f(x) = e(x-1)$, $g(x) = u'_M(x)(y_E - y_U)$,其图像叠加可能出现的 4 种情况(见图 2)。

按 e 由小变大的顺序讨论 4 种情况下的均衡:

(1) 当 $-e > u'_M(1)(y_E - y_U)$, $f(x)$ 远高于 $g(x)$, $\forall x_i$, $\bar{x}_M \in [0, 1]$, $EV'_M(x_i) = -e(1-\bar{x}_M) - u'_M(x_i)(y_E - y_U) > 0$, $EV_M(x_i)$ 在 $x_i = 1$ 处实现最大值。无论其他人如何选择身份定位,此时,农民工的最优选择都为完全市民化。
 (2) 当 $u'_M(1)(y_E - y_U) > -e > u'_M(0)(y_E - y_U)$, $f(x)$ 仍高于 $g(x)$ 时,如果 $x_i = \bar{x}_M$, $\forall x_i \in [0, 1]$, $EV'_M(x_i) > 0$, $EV_M(x_i)$ 在 $x_i = 1$ 处实现最大值。即在对称情形下,此时,农民工的最优选择都为完全市民化。
 (3) 当 $u'_M(1)(y_E - y_U) > -e > u'_M(0)(y_E - y_U)$, $g(x)$ 的中间段向上穿过 $f(x)$ 时,出现两个交点,记左边交点的横坐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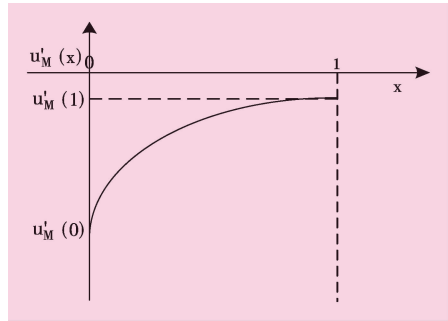


图 1 $u'_M(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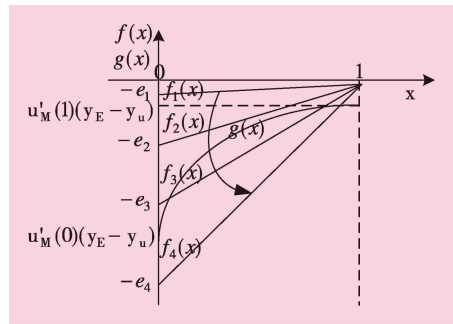


图 2 $f(x)$ 与 $g(x)$

为 \underline{x} , 右边交点的横坐标为 \bar{x} 。如果 $x_i = \bar{x}_M$: $\forall x_i \in [0, \underline{x}]$, $EV'_M(x_i) > 0$, $EV_M(x_i)$ 在 $x_i = \underline{x}$ 处实现最大值; $\forall x_i \in [\underline{x}, \bar{x}]$, $EV'_M(x_i) < 0$, $EV_M(x_i)$ 在 $x_i = \underline{x}$ 处实现最大值; $\forall x_i \in [\bar{x}, 1]$, $EV'_M(x_i) > 0$, $EV_M(x_i)$ 在 $x_i = 1$ 处实现最大值。即在对称情形下,此时,农民工的最优选择都为完全市民化或半市民化。
 (4) 当 $-e < u'_M(0)(y_E - y_U)$, $g(x)$ 下穿 $f(x)$, 出现一个交点,记交点的横坐标为 \hat{x} 。如果 $x_i = \bar{x}_M$: $\forall x_i \in [0, \hat{x}]$, $EV'_M(x_i) < 0$, $EV_M(x_i)$ 在 $x_i = 0$ 处实现最大值; $\forall x_i \in [\hat{x}, 1]$, $EV'_M(x_i) > 0$, $EV_M(x_i)$ 在 $x_i = 1$ 处实现最大值。即在对称情形下,此时,农民工的最优选择都为完全市民化或完全农民化。可以证明,这些均衡都是稳定的^①。

由以上分析知,农民工最优的身份定位与同期群效应的强度、身份定位对失业率的边际影响、在业和失业状态下的收入差距有关。在以上情况下,完全市民化都是农民工的最优选择(后 3 种情况需对称),但有时农民工的最优选择还有可能为半市民化或完全农民化。因为市民化会产生成本,但会对就业带来好处;农民化会减少成本,但会对就业带来坏处;同期群效应能改变此处的成本—收益状况。

三、实证研究

为检验结论,以下采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 2009 年初对武汉市进城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① 考虑篇幅因素,本部分数学证明从略。

由于前文假定,本文不考虑劳动者自我雇佣的情况,故从数据中剔除这类样本。经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N=1098)

项目	频数	百分比	项目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文化程度		
男性	839	76.4	从未上过学	33	3.0
女性	259	23.6	扫盲班	7	0.6
年龄			小学	211	19.2
16~29岁	385	35.1	初中	578	52.6
30岁及以上	713	64.9	高中	191	17.4
婚姻状况			中专/职高/技校	54	4.9
未婚	266	24.2	大学本科及以上	7	0.6
已婚/同居	809	73.7			
离异	9	0.8			
丧偶	14	1.3			

注:对应前文理论划分,调查中16~29岁的对象属于第二代,30岁及其以上的属于第一代。这使本表中年轻一代的比例较低,但若按世界卫生组织对青壮年的定义(上限为45岁),该比例达到84.5%,符合全国一般情况。年龄的统计均值与标准差同样可以证明该调查项的数据结构合理(年龄均值为34.7,标准差为10.9)。

表2 农民工的流向决策(N=817)

农民工决策	样本总体		第一代样本		第二代样本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留在城市	480	58.8	283	57.4	197	60.8
回老家	112	13.7	74	15.0	38	11.7
回老家县城 或小城镇	225	27.5	136	27.6	89	27.5
总计	817	100.0	493	100.0	324	100.0

表3 农民工的身份认定与流向决策(N=817)

流向决策		身份认定					
		样本总体		第一代样本		第二代样本	
		农民	市民	农民	市民	农民	市民
留在城市	频数	429	51	260	23	169	28
	百分比	57.5	71.8	56.2	76.7	59.7	68.3
回老家	频数	102	10	68	6	34	4
	百分比	13.7	14.1	14.7	20.0	12.0	9.8
回老家县城 或小城镇	频数	215	10	135	1	80	9
	百分比	28.8	14.1	29.2	3.3	28.3	22.0
总计	频数	746	71	463	30	283	41
	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数据清理,剩余817个有效样本,其流向决策如表2所示。

表3为农民工的身份认定和流向决策交叉表。此“身份认定”与前文“身份定位”不同:后者是农民工有关身份的决策,“完全市民化”、“完全农民化”、“半市民化”将分别导致进而对应表中的流向决策“留在城市”、“回到老家”、“回到老家的县城或小城镇”;前者是农民工有关身份的判断,是市民如何看待自己、群体中其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等信息在农民工内心的映射,是客观评价与主观感受的综合。如果受访者回答自己是市民,那么从客观和主观两个角度看,他多半不再适合被打上“农民工”标签,即对其而言,同期群效应非常小,反之亦然。从表3可以看到,在认为自己是市民的人中,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倾向于回到老家、回到老家的县城或小城镇。Zimmermann等(2007)的研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在该研究中,移民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归属感不是线性排斥的。

以下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对前文结论进

行检验。将农民工的流向决策作为因变量,将前文提到的诸因素作为自变量。变量描述见表4。其中:(1)流向决策可等同为身份定位;(2)身份认定与同期群效应相关,认为自己是农民的样本同期群效应大,认为自己是市民的样本同期群效应小;(3)社会资本与失业率负相关,这一点容易理解^①;(4)在不考虑自我雇佣且不改变地理位置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与其在业和失业状态下的收入差距正相关。被估计模型如式(11)、式(12)所示。哑变量的参照组均为最后一个分类。

$$\log \frac{P_1}{P_3} = \alpha_{13} + \beta_{13} I_1 + \chi_{13} SCI_1 + \delta_{13} SCI_2 + \varepsilon_{13} SCI_3 + \phi_{13} SCII_1 + \varphi_{13} Y + \gamma_{13} AGE \quad (11)$$

$$\log \frac{P_2}{P_3} = \alpha_{23} + \beta_{23} I_1 + \chi_{23} SCI_1 + \delta_{23} SCI_2 + \varepsilon_{23} SCI_3 + \phi_{23} SCII_1 + \varphi_{23} Y + \gamma_{23} AGE \quad (12)$$

模型的似然比检验结果 $P=0.000$ 。Cox 和 Snell、Nagelkerke、McFadden 的 R^2 分别为 0.169、0.200、0.099。对各自变量的作用进行似然比检验的结果显示,其对模型的作用都有统计意义。估计系数如表5所示。从表5我们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第一,当在“回到老家的县城或小城镇”与“回到老家”中选择:身份认定为农民的人比身份认定为市民的人更倾向于前者,这对应于半市民化选择为最优的第三种均衡(不考虑理想状态即完全市民化,下同);身份认定为市民的人比身份认定为农民的人更倾向于后者,这对应于完全农民化选择为最优的第四种均衡。就模型看,两类人做出截然不同选择原因在于同期群效应的大小不同。对此,第二类人的最佳实例莫过于频现媒体报道的“返乡金凤凰”。可以理解,农民工在城镇越成功,越脱离其群体,对成为市民的渴盼就越弱,做

表4 变量描述(N=817)

变 量	百分比
流向决策(DM)	
1= 留在城市	58.8
2= 回到老家	13.7
3= 回到老家的县城或小城镇	27.5
身份认定(I)	
1= 农民	91.3
2= 市民	8.7
社会资本 I (SC I)	
与本人在工作中相处	
1= 很好	36.0
2= 较好	33.4
3= 一般	28.5
4= 较差	2.1
社会资本 II (SC II)	
在工作外与本地人	
1= 交往	45.8
2= 不交往	54.2

表5 估计系数

因变量	$\log \frac{P_1}{P_3}$	$\log \frac{P_2}{P_3}$	$\log \frac{P_1}{P_2}$
常数(α)	-0.666	9.431***	-10.097***
身份认定(I)			
农民	-0.906**	-1.110**	0.204
社会资本 I (SC I):			
与本地人在工作中相处			
很好	1.795***	1.274	0.521
较好	0.911**	0.566	0.345
一般	-0.099	0.167	-0.266
社会资本 II (SC II)			
在工作外与本地人交往	0.338*	-0.437*	0.774***
务工收入(Y)	0.105	-1.120***	1.226***
年龄(AGE)	0.007	0.039***	-0.032***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下显著。

① 由于数据缺乏,本文无法检验前文所述失业率与身份定位之间的进一步关系。

决策时更多考虑的是其他因素。那些依然带着农民工标签的相对失败者则适用“随波逐流更省力”原理,即使无法留在大城市,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也是回到老家的县城或小城镇,因为同期群效应会使他们这样做的成本—收益状况优于回到老家。

第二,当在“留在城市”和“回到老家的县城或小城镇”中选择,与本地人在工作中相处很好和相处较好的人比相处较差的人更倾向于前者;对在工作外与本地人交往的人来说,其流向决策的偏好顺序是“留在城市”>“回到老家的县城或小城镇”>“回到老家”,在工作外不与本地人交往的人相反。原因容易理解,也可观察 θ_M 和 u_M 的表达式:农民工在本地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就能越多地接触工作信息,越多地获得工作越少失业,效用的增加促使农民工做出市民化选择。考虑到现实中拥有更多本地社会资本的农民工往往是市民化程度更高的农民工,身份定位会对农民工的失业率产生影响,进而反作用于其自身也就得到了证明。

第三,务工收入越高,农民工越不倾向于“回到家乡”,但该项对他们选择“留在城市”还是“回到老家的县城或小城镇”没有太大影响。前一点容易理解,因为在业和失业状态下的收入差距 $y_E - y_u$ 越大,个人最优的选择就越倾向于市民化。对于后者,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在“留在城市”与“回到老家的县城或小城镇”中进行选择时,面对 $u'_M(x)$ 和 $y_E - y_u$ 的综合影响也许大致不变。为解释这一点,将“回到老家的县城或小城镇”作为参照,可以看到,进一步的市民化即去往城市固然会提高 $y_E - y_u$ (城市的工资水平一般高于县城或小城镇,同时,目前针对农民工的失业保障制度也不健全,导致农民工的失业收入较低且相差无几),但 $u'_M(x)$ 的绝对值却会下降(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一般更加严重)。

至此,前述模型结论基本得到证实,即同期群效应、身份定位对失业率的边际影响、在业和失业状态下的收入差距都会影响到农民工的身份定位。此外,实证分析里,年龄项的情况也可作为对该结论的进一步综合验证。容易发现,年龄越大的农民工越倾向于“回到老家”,可供解释的原因包括:(1)年轻的农民工往往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使他们的务工收入较高,在业和失业状态下的收入差距 $y_E - y_u$ 较大,个人最优的选择更倾向于市民化;(2)年轻的农民工往往更乐于并易于与本地人交往,在本地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能更多地接触工作信息,更多地获得工作进而更少地失业,个人最优的选择更倾向于市民化;(3)受“落叶归根”心态驱使,年老的农民工群体趋向于农民化,其造成的同期群效应和前文相反,个人市民化的成本会因此增加,促使其更倾向于农民化。

四、结论与讨论

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国际经验表明,实现绝大多数乡—城流动人口的城市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出路。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客观必然性,但目前许多农民工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停滞不前,多半被认为是“能力问题”或者“制度问题”,但我们认为这也可能是“意愿问题”。能力可以提高,制度可以改善,然而在意愿方面,一旦形成强大的“农民化同期群效应”——当累积到一定程度,这种效应足以形成“陷阱”,不仅让“落叶归根”者返乡,让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能力不足者返乡,而且让更适宜配置到城镇的劳动力资源也随浩浩

荡荡的队伍返乡,这从宏观和长远角度看是非常不利的。

与能力问题一样,从根本上说,意愿问题也还是制度问题。无论农民化还是市民化的同期群效应,都是由农民工个体决策进而行为的外部性造成。比如,当农民工选择了市民化的身份定位,往往不仅有利于他个人的就业,也会增加其他农民工在劳动市场的社会资本,从而也有利于他们的就业,这即是前文“群体中其他人市民化水平的提高能减少单个人的市民化成本”的一个例证。反之,如果劳动市场不是这样,比如二元分割严重,农民工选择市民化的身份定位不能带来多少就业上的改善,那么个人就不会耗费成本这样选择。当更多的人不这样选择,基于同期群效应,也许就会出现个人市民化的成本超过收益的情况,人们便开始农民化。当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有土地这道退可谋生的底线,在二元分割严重的城镇劳动力市场翻不了身的农民工为什么不回去,或者为什么不理性地保持半市民化状态?

前文分析了农民工的身份定位受同期群效应的强度、身份定位对失业率的边际影响、在业和失业状态下的收入差距三因素的影响。此时容易发现,决定农民工怎么做的最终还是制度。从同期群效应角度看,制度影响了个人选择,个人选择的累积决定了群体状况,群体状况反过来影响个人选择;劳动市场的就业和报酬情况则更与制度有关。那么,要引导农民工在身份定位方面的选择以有利于宏观和长远,也应当着眼于制度。可以考虑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等入手,结合当前发展重点转向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城市化特点,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埃尔德(2002):《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译林出版社。
2.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3. Akerlof, G., Kranton, R. (2000), Economics and Ident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5, No.3, pp.715-753.
4. Battu, H., McDonald M., Zenou, Y. (2007), Opposi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Labor market. *Journal Population Economics*. Vol.20, No.3, pp. 643-667.
5. Bisin, A., Patacchini E., Veridier T., Zenou, Y. (2006), Bend It Like Beckham: Identity, Socialization and Assimilation.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5662.
6. Demartini, J.R. (1985), Change Agents and 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 Reevaluation of Mannheim's Problem of Generations. *Social Forces*, Vol. 64, No.1, pp.1-16.
7. Kertzer, D.I. (1983), Generation as a Sociological Proble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9, pp.125-149.
8. Mason, P.L. (2004), Annual Income, Hourly Wages, and Identity among Mexican-Americans and Other Latinos. *Industrial Relations*. Vol.43, No.4, pp.817-834.
9. Nekby, L., Rödin, M. (2007), Acculturation Identity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IZA discussion paper, No.2826.
10. Ryder, N.B. (1965),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0, No.6, pp.843-861.
11. Zimmermann, L., Zimmermann, K.F., Constant A. (2007), Ethnic Self-Identification of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41, No.3, pp.769-781.

(责任编辑:朱犁)